

【书香社会】

钱穆阅读观浅析

●丁 洁 (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 410081)

[摘要]作为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钱穆可谓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在自学苦读的生涯中,钱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阅读观,具体表现为以古为主、中西兼通的阅读对象;虚心会疑、博通精思的阅读方法;有益于身、有益于世的阅读动机。钱穆的阅读观也为当今读者如何阅读、树立正确的阅读观提供了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钱穆 阅读观 阅读活动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45(2021)01-0075-04

[引用本文格式]丁 洁.钱穆阅读观浅析[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1(1):75-78

钱穆(1895—1990),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穆学问渊博,一生著述达80余种,他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钱穆少时因家贫辍学,高中尚未毕业就进入乡村小学教书,他能取得如此成就,与他在自学时形成的阅读观是分不开的。

1 中西兼通的阅读对象

“任何阅读活动都由阅读主体——读者依据一定的时境,采取一定的手段,指向一定的对象。这个被读者认识和把握的客观对象,简言之,就是读物。它对读者及其阅读起着规范、制约作用”^{[1]21}。这里所讲的读物,主要是纸质书籍。钱穆的阅读对象以旧籍为主,但也并不排拒新书。

钱穆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受家庭熏陶,钱穆幼时的阅读对象多以古籍为主。在祖父的影响下,他“自知读书,即爱《史记》”^{[2]6}。七岁入私塾,除阅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等,钱穆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也很感兴趣。进入新式学校后,又有了更多阅读的机会。在南京钟英中学,钱穆所读之书多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唐宋八大家散文,以及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之类^{[3]22},这些为他之后的自学奠定了丰厚的知识基础。在之后的自学苦读生涯中,钱穆读到的古籍数量和种类更加广博,经史子集,无所不包。除了续读五经、《十三经注疏》《朱子语类》等儒家经典外,还有《昭明文选》等诗文集,《庄子》《墨子间诂》《六祖坛经》《指月录》等著作,《后汉书》《清史稿》《三朝北盟会编》《文史通义》等史籍和史学理论著作,所读之书甚多,无法
万方数据

一一列举。他自称“最先从韩柳古文唐宋八家入门,随即有意于孔孟儒学,又涉及古今史籍。墨学实非所喜,而耗精粹神于此者亦复不少”^{[2]77-78}。

在苦读旧籍,日求长进的同时,钱穆并不排拒西书,而且也关心时事,对当时的新思想、新学说颇为关注,多有接触。在私塾时,塾师曾为其讲授《地球韵言》。这是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启蒙读物,内容多为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之类,钱穆对其中的瑞典、挪威等很感兴趣。在果育小学,钱穆读了其师赠送的《修学篇》,书中介绍了西欧各国未经学校教育而自学成才的数十名学者,钱穆辍学后矢志自学,就是受到此书的激励。他还接触到了阿拉伯神话小说《天方夜谭》以及林琴南所译的西洋小说,眼界日渐开阔。即使在乡村教书,也在“授课之暇,阅读每以报章杂志为先导”^{[4]1}。在三兼小学,读遍严复所译之书,自谓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和穆勒的《名学》“受感最深,得益匪浅”^{[2]68}。1919年,美国实用主义学者杜威来华讲学,钱穆也颇留意其教育、哲学思想,他转入后宅初级小学担任校长的直接动因就是希望能与幼童接触,从头做一番实验,以弄清古今中外教育思想的异同得失所在。当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钱穆也逐月研读《新青年》杂志。受梁启超“自修日本文,不两月,即能读日本书”的影响^{[2]113},钱穆也曾自修日文,略通其文法。曾试译日人林泰辅《周公传》的一部分,付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书虽只是稍有涉猎,仅读《西洋通史》《圣经》《现代历史哲学》等,但也认为“对余影响实深,精力未为白费耳”^{[2]208}。

阅读活动是“读者——读物——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的关系网,它不能超越环境孤立地产生和发

展。阅读环境泛指所有影响读者阅读的所外界力量的组合^{[1]53}。钱穆之所以阅读广泛,与他所处的阅读环境息息相关。就宏观环境而言,钱穆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民族危机深重,西学大量传入中国,因此他所接受的教育呈现传统与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的特点,这也决定了钱穆既能阅读大量古籍,也能接触西书;就微观环境而言,钱穆出身书香世家,年幼时其父亲就经常指导他读书,尤其是儒家经典,在新式学校,他遇到的老师,既有旧学根底深厚的宿儒,也有海外留学归来具有新思想的教授,他既能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又得以接触西学,大开眼界,而之后的任教经历,无疑给了他更多阅读的机会;在客观环境上,钱穆虽在许多地方任过教,阅读的环境也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清幽安静,有山水、园林之胜;在主观环境上,钱穆失学后即矢志自学,他在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对历史怀着“温情与敬意”的同时,对西方文明也不排斥,认为要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些环境因素互相联系,形成一个总的合力,对钱穆的阅读活动起着促进作用。

以上只是钱穆作为一名学者的个人阅读经历,他同时也指出,读书并不一定要在一种特殊的环境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中才能进行,社会上一般人都能够从事阅读活动。因此对于业余读者,钱穆也推荐过一些书目,比如:修养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为人人必读之书;欣赏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文学作品;博闻类:没有硬性规定,只求自己爱读,史传、游记、科学、哲学均可;新知类:随时在时代中求新知,如报刊、杂志等;消遣类:小说、剧本、传奇等,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5]326}。

2 博通精思的阅读方法

钱穆阅读广博,但如果只是一味死读而不讲究方法,也是不行的。虽然在茫茫学海中,他缺少名师的指导和学友的切磋,但也“一路摸黑,在摸黑中渐逢光明”^{[5]449-450},探索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阅读方法。

2.1 虚己从人,好学会疑

钱穆认为,读书首先要心虚,心虚有两层含义:第一,阅读一本书,要想读有所得,首先要带着客观的态度去了解书中的本意。“莫要自己心下先有一个意思”,也就是不要硬将自己的意见附会到书中,把自己的意见当成书中的意见。读书不会一看便晓,要真正了解到书中本意,还得静下心来,跟随文

本反复不厌地看。“若骤读一本书,便要求明得种种理,又要求于己有所得,此皆是心不静。从来读书,亦无此速化之法。”^{[6]32-33}但在另读新书的时候,又要暂时先将之前的阅读所得从心中除去,譬如一无所知般,这样才会客观地看待新书中的观点。另外,任何一本书都不会让所有人满意,阅读时要能采其长,而不是专指其短^{[7]213}。

第二,读书要从容,不能急功近利。读书时不应先问效验,如果“只就书看书,只办此一条心”^{[6]35},熟看熟思,自然会有收获。他曾教育学生,书读多了,积累多了,自然能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时就会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受。形之为文章,也就必然能言之有物,能发前人之所未发^{[8]26}。若只为找材料而读书、为写论文而读书,读者很容易因为关切自己本身思考的问题,而略过书中的精华。他还认为,“有了工夫,才能有表现”。如果把读书当作是作文的工具,便成了表现为主,工夫为次。要是读书只是东翻西阅,来搜求一二题目,写成一篇文章,长此以往,这种风气会养成学术界一种懒且躁的心理。“懒”是不肯静下心来,熟读精读;“躁”则是急于成名,好出风头,掩盖前贤,凌驾古人^{[6]90}。因此,钱穆也反对梁启超奖励青年好著书的观点。如果只是为了著述而读书,对读书所得的印象决不会很深,因为读者早已心浮气躁,所读之书,只会被当成他著述的材料,而不肯虚心静气浸入书籍的深渊处。如此下去,“读书”工夫会渐渐演变成“翻书”,“那种为著述而读书的习惯,只能领你走上无修养、无思想的路”^{[6]139}。

但是读书心虚、不把自己意见当作书中意见,并不意味着读书无主见。古人言:“学必会疑始有进。”书读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产生疑问。因此,既不能“不敢妄议前辈”,也不能有“莫轻信前人”的想法,这样只会深闭固拒,永无进益。钱穆曾读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得益甚大,对其“仅标几要点,多抄录事迹原文。无考据方式,而实不背考据精神”十分欣赏^{[2]72},他写《先秦诸子纪年》,更改《史记·六国年表》之误,最先受到夏氏的影响;他的《国史》大纲在编写的目的、体例、方法以及撰史内容等方面也多受夏曾佑著作的启发。但是钱穆对夏氏书中的观点并不盲从,而是敢于质疑。1934年,他在《大公报》图书副刊第20期上发表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书评,对夏曾佑的一些观点多有批评、指责处。抗战时期,钱穆在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时,又细读其著作,列举书中错误一百七十

余条^{[3]26}。

2.2 先通后专,勤读精思

钱穆以史家的眼光,提出读书贵在会通。“通”是“专”的前提,应该先通过广博的阅读打好基础,然后才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专门之学。“若只就画论画,就艺术论艺术,亦如就经论经,就文史论文史,凡所窥见,先自限在一隅,不能有通方之见”^{[9]283}。他认为现代学术界最不好的风气,是先将学问分成类,再把自己限在某一类中。只知专门,不求通学。因此现在的专门家,反而不能成一家之言^{[6]159}。钱穆自身学问广博,其弟子评价他“于经史子集、中西文化学术,无不精研穷治,博达而宏通,取汉学、宋学之长,融考据义理为一,卓然自成一家之言”^{[8]67}。他也会教育学生,治史要识大体、观大局、明大义,可以着重于某一断代史或某一专门史,但不能密闭自封其中,不问其他。要通与专并重,以专求通,才能有大成就^{[8]13}。“通”的另一层含义是不能断章取义,在没有整体了解的情况下妄下结论。如读《论语》时,只抓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一言半句,不看看孔子《论语》二十篇剩下的内容又说了什么,便批评其都是封建糟粕;读历史时,看到只言片语,却不再问整个《二十四史》都记载了哪些内容,便只说中国历史专制、不民主、顽固、不开通,这样得到的对孔子思想与中国历史的看法,也只能是“己见”而已^{[6]36}。

钱穆也赞同朱子“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的看法,博览的前提是在具体阅读某一本书时,要熟读精思。“当知只有看一书彻了,才是博极群书法,亦才是学穷精微法。连一书都看不彻,遑论其他”^{[6]40}。有些经典著作,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读一两遍是不行的,要反复读,读熟。与其十本书只读一遍,不如把一本书读十遍。读书时要善于思考,首先要注重时代背景的分析。他在1926年出版的《论语要略》中指出:“求识孔子之为人,不可不知孔子之时代背景。”在《墨子》一书中又指出:“要了解墨学的起源,不可不知墨子时代学术界的情形。”^{[3]63}其次,读书先读人。每一本书的背后都有其作者,只有了解每一本书的作者,才能懂得书中所蕴含的活的精神。如果只是把书当作一堆堆材料看,不能看到书中的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就失去了阅读的意义与价值^{[10]11}。最后,不动笔墨不读书。钱穆教育学生读书时遇到惬意处要加以笔录,但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

万方数据

步的研究^{[8]128}。

除了虚己从人、好学会疑和先通后专、勤读精思,在阅读方法上钱穆还提出了一套独到的“读书如游山”理论。他认为,在观赏风景时,只有一心用在山水之间,方能乘兴之所至;读书便有如游山一般,只要专心致志,心无二用,自然能从中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另外,登山时拾级而上,每登临一山峰,俯视山下,都会有不同的景象,殆至顶峰,然后方能领略一个全新的境界,方能“一览众山小”。读书也应如登山一般,随着读书越多,思考的问题越多,就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进入不同的思想境界,不至沾沾自喜于一隅之得,死守在一个狭窄的天地里^{[8]28}。最后,登山时,不能只是一路往上爬,总要爬一段便回过头来四面望一下,特别是跑到山顶的时候。做学术也要经常回顾,有一番登高远瞩的景象^{[10]14}，“只是向前趲,亦是心不静。懂得向后反复,才有基址可守,才有业绩可成”^{[6]37}。

3 有益于世的阅读动机

阅读动机是读者从事阅读活动的动因,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有了阅读需要,才能产生阅读的欲望,才能寻找和选择到具体的阅读对象,形成明确的阅读目的,产生强烈的阅读动机和浓厚的阅读兴趣,推动读者进行阅读^{[1]161}。钱穆的阅读动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有益于身,有益于世。

3.1 有益于身

钱穆认为,对个人来说,读书不能专为谋生,更重要的在于懂得如何培养生活情趣、提高人生境界。在书中可以碰到很多人,这些人的境界高、情味深,能够成为读者的榜样。我们都是普通人,但在书中遇见的人是由千百万人中选出,又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得以保留至今^{[5]320}。他在《灵魂与心》中说过:“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挥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比如,孔子的自然生命虽然在两千五百年以前,但孔子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却延续至今。钱穆年轻时曾随意翻书,但是他以曾国藩为榜样,曾文正家训教人读书要从头读到尾,不能随意翻阅,不能半途终止,钱穆即改正此不良习惯,“凡遇一书必从头到尾读”^{[2]75}。

此外,他还指出,读书的第一要义,是明白做人的道理。为学与做人,是一事之两面。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做人的条件不够,那么他所做的学问,便不能

达到更高的境界;另一方面,训练一个人做学问,同时也是在训练他做人,如虚心、肯负责、有恒、淡泊名利等,这些都属于人的品性。具备了这些品性,才能做一个理想的人,才能做出理想的学问。真做学问,则必须同时训练此种德性。若忽略了此一面,便不能真正达到那一面^{[8]205}。

3.2 有益于世

钱穆出生于 1895 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后一年,因此,他的一生一直与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相始终,他的读书与治学始终充满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家、爱民族的真挚情感。他强调读书人立志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9]265}，“第一流”与“第二流”的差别就在于能不能经世致用,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他批评当时的读书风气还脱离不了极狭的门户之见,只看重在小节目上的训诂与考据,而看轻从学问大体上来求得大义的融会与贯通。若只为学术而学术,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成为“博士”,不能成为“士大夫”。因为士大夫能够从书中读得义理,为社会所用^{[6]93}。

钱穆致用的阅读观也推动着他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当时国难深重,国人对本国历史文化自信心全无,钱穆深感不平,他是怀着维护祖国文化、挽救民族危机的宏愿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他撰写《国史大纲》,是为了“重明中华史学”,“本不愿急切成书,特以国难振触,不自抑制耳”^{[8]17};抗战时期,他的著述演讲每“以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他还呼吁加强国民历史教育,认为国史教育的意义,首先应使国民认识到本国

已往历史的真正价值,从而启发国民具有文化意味的爱国精神,同时培养深厚的奋发复兴的想象与抱负^{[7]159};为了在香港这块殖民地上弘扬中国文化,他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创办新亚书院,除授课外,又面向社会开办一系列文化学术讲座,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他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以宏道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也激励着后人为弘扬中华传统而奋斗。

钱穆的学术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阅读观,通过对钱穆阅读观的探析,我们可以感受到以钱穆为代表的那一辈学人读书治学的严谨以及阅读背后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的读书观虽然大多是从做学问着眼而提出的一些读书要求和见地,但是对于启发普通读者树立自己的阅读观也不无裨益。

参 考 文 献

[1] 曾祥芹,韩雪屏. 阅读学原理 [M]. 开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

[2] 钱 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M]. 长沙:岳麓书社,1986.

[3] 陈 勇. 钱穆传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 钱 穆.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一册) [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5] 钱 穆. 历史与文化论丛 [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6] 钱 穆. 学龠 [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

[7] 钱 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 [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 钱穆纪念文集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 严耕望. 治史三书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0] 钱 穆. 中国史学名著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作者简介]丁 洁,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8 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9-11-24 (刘 平 编发)

On Qian Mu’s View of Reading

Ding Ji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As a famous scholar in modern China, Qian Mu was really a model of self-taught talent. In self-study, he formed his own special view of reading. On the way of the object of reading, Qian Mu mainly read ancient books, but he was also interested in western books. On the reading methods, he advocated to be modest and incredulous, knowledgeable and noematic. On the motivation for reading, he argued that people should rea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Qian Mu’s view of reading also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oday’s readers.

Keywords Qian Mu. View of reading. Reading activities.